

名人轶事

蒋介石日记中的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无论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还是孔夫人宋霭龄，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舆论关注。因为独特的身世、特殊的姻亲关系，姐妹三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使人们可以从他的内心独白中窥探出他与宋氏姐妹的关系。

蒋介石称宋美龄身上凝结了浓厚的母性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大篇幅记载。从婚后不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才情、胆略与智慧非常欣赏和敬重，某些文字中甚至透露出他对宋美龄超乎一般地依恋。

1930年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20多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3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刻骨铭心的经历。后来宋美龄前往西安救助他，在见到宋美龄的那一刻，蒋介石禁不住号啕大哭，在日记记述中他毫不掩饰，在危急关头宋美龄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让蒋介石终身感激不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日记

中，他也大量记载了宋美龄的出访与外交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抗日外交中十分依赖宋美龄。1943年3月2日，他充满自责地记载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事活动：“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但深信其结果于国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每次提到宋霭龄，都会表现出浓浓的亲情

与宋美龄相比，他写宋霭龄笔墨虽少，但在记载中总是透出浓浓的亲情。对此，一些与宋氏姐妹关系比较亲密的美国顾问曾有过一些猜测，他们认为蒋夫人受孔夫人的影响甚巨，政治上，蒋介石信任孔夫人甚于信任自己的妻子。美国顾问的结论虽然有些武断，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霭龄确实充满了好感。

1927年12月结婚后不久，就宋子文是否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职位问题，蒋介石与宋子文、宋霭龄（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之为大姊）有一次重要的谈话。他们在一起谈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蒋介石希望宋子文能够出来主持财政部，但最初被宋子文拒绝了，“心甚悬念，其不愿负责也。”

一周后，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他与宋美龄外出骑马郊游，“下午假眠后，访冯夫人……晚餐后访大姊，谈时局，彼甚以余游意为虑，且轻

视之，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他不仅与宋霭龄谈论时局，宋霭龄似乎还扮演了师长的角色，竟然警示蒋介石不能耽于享乐。对于宋霭龄的警告，蒋介石没有生气，但是非常不服气，也非常受刺激，他认为这是她不了解他的远大志向，他决心要做出一些成绩给宋家人看。

宋霭龄更像是蒋介石的长辈，她的关怀和鞭策，确实能使他有所警醒。

1934年2月4日，蒋介石再次同宋霭龄、宋美龄游览六和塔，与宋子文谈话。宋霭龄在蒋介石日记中不时地出现，表现为一个有思想、善决断，且充满人情味的长姐，符合蒋介石对亲情的需要。而宋霭龄在孔家和宋家的影响力，是此时蒋介石比较重视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庆龄的记述最少，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所交往的记载。但是每次提到宋庆龄，蒋介石一般都尊敬地称其为孙夫人。1943年3月12日下午3时，他与蒋纬国一起拜访孙夫人，“以本日为总理逝世忌辰”。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并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示慰问。当天宋庆龄也非常热情，她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为此，蒋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诚意，他得意地对蒋纬国说：“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



从左至右为：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但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会忍不住流露出憎恨之情，这时他不再恭敬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在旧金山会议前，中、苏、美等国就旧金山会议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纳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苏联曾给蒋介石很大压力，但是蒋介石拒不接纳，而宋庆龄也曾与蒋介石商议，让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这年3月中旬，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共匪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

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15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蒋介石日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还是不同于社会的一些观感和猜想的。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来看，他对宋庆龄比较疏远，但除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历的记载。

（摘自河北新闻网）

徐志摩一生为之所困的4位女性

徐志摩一生为4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分手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以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的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这时，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负盛名的3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

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仅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是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鸚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清秀明净……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

却又是那么的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的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到达。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的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不久后，陆小曼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差阳错，他总认为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己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作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实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摘自《书摘》）



徐志摩



张幼仪



林徽因



凌叔华



陆小曼

文史典故

“倒霉”由“倒楣”演变而来

“倒霉”比喻事情办糟了。其实“倒霉”是由“倒楣”演变而来的。

明代末年，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一些学子为了能顺利考中，离家赴考时，会在家门前景起一根旗杆以图吉利。如考中了，旗杆照旧树在门前，如果落第了，旗杆就要放倒，因旗杆又叫“楣”，所以就该“倒楣”了。天长日久，人们把“倒楣”就叫成了“倒霉”。（李德昌）

“衣冠禽兽”原非贬义

“衣冠禽兽”一词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的官服上绣禽，武官的官服上绣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兽也不同。

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鹏，六品绣鸳鸯，七品绣溪鸟、勒鸟，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绣狮子，三品绣虎，四品绣豹，五品绣熊，六品、七品绣彪，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九品穿绿袍。所以，当时“衣冠禽兽”一词是赞语，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武官员欺压百姓，声名狼藉，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词开始具有贬义。老百姓就把那些为非作歹的文武官员称为“衣冠禽兽”。

其贬义之称始见于明朝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一书。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词遂用于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李德昌）

史海回眸